

楊文驄



傳論



白堅著

楊文驄傳

劉海粟題



封面题字：顾廷龙

责任编辑：沈宝发

封面设计：陆全根

杨文瑞传论

白 坚 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社科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 0×11 6 1/32 印张 7·5 附图 20 页 字数 170 000

1990 年 3 月第 1 版 199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 1—1,000

序

丁 芒

我志于诗，多年从业于文学的编辑撰著，却又喜涉猎史籍，尤耽晚明，使风云磅礴、人物跌宕于胸臆之间，呼吸之，俯仰之，每引以为快。其实适性而已，非为治学。

近年，在江苏省美学学会年会中，得读白坚同志论杨文驄美学思想长文，怦然有动于心，询知尚有《杨文驄传论》之作，亟索观全帙，顿开蒙翳。这才知道，历史真面目竟有被歪曲颠倒如是者。当时固然出现少数出于偏见的不实记载，也留下关于他的心志业绩的大量实录。后人不肯下苦功稽古钩沉，客观辨析，也不曾出大力详加探讨，从而表彰阐扬，致使杨文驄沈埋两三百，伟烈不显，是非不明。在现当代，《桃花扇》改编为戏剧、电影，杨文驄被塑造为反面形象，甚至有人撰文痛斥他“人品”“卑下”，“一生作了不少的坏事”，就更加是非颠倒，沉冤莫白了。

杨文驄其实是个不平凡的人物。论业绩，他是在抗清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一位轰轰烈烈的英雄人物，一位铁骨铮铮，坚持民族气节，宁死不屈，献出全家生命的抗清烈士。论人品，他是胸怀大志，慷慨激烈，嶷崎历落，倜傥风流，大气磅礴，不拘小节的忠义自守之士。论才学，他又是晚明著名诗人、画家，诗被列入晚明八大家之选，画虽流失过多，仍以独辟蹊径，师造化，崇神韵，质朴浑成中显雄奇幽峭，而蜚声艺坛，历来目为珍品。

对这样一位大节凛然而又才华横溢、诗画造诣极高的爱国名士，为什么竟被歪曲，被湮没，至今还遭人诬蔑毁伤呢？其症结就在于他与马士英、阮大铖的关系上。阮固阉党，马亦无清名，当时弄权于弘光小朝廷，颇遭訾议。杨文驄因与马士英

的亲缘关系，得入仕兵部，且迭次升擢，自然会被目为攀附，从而他的一切言行，均被笼上一层瘴雾，甚至他出于爱国壮概、文人习气，与诗人画家和有志之士唱游交往，加入爱国团体复社；以及他利用自己身份，周旋于朝野双方、忠奸人物之间，以维护爱国志士的权益安全，种种作为，均被歪曲，连后来苏州除奸、壮烈殉国，这种彪炳千秋的壮举，也无端见疑，横遭诽谤。不能不说是千古之冤，尤其以骂名加诸烈士英灵之上，能令后世有识之士不为之扼腕长太息吗！又怎能不使专事爱国主义传统研究的白坚同志投袂而起，慷慨陈词，力排众议，而正视听呢！

于是，有《杨文驄传论》之作。

白坚从五十年代起就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更着重古代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传统研究，对明、清之际爱国主义作家作品尤为专注，成就显著。其《夏完淳笺校》一书，积三十年之功，用力甚勤，考订精当；论文一百余篇，颇多创见。《杨文驄传论》正是他这一总体中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篇幅虽不大，而每一章节、每一论断都是二十多年搜集、积累、考订、探讨的结晶，真可谓呕心沥血、惨淡经营之作。

因为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之下研究撰著的为杨文驄平反辨诬之作，作者的自我要求，就更为严格。

首先，正由于杨文驄被沈埋、被湮没，资料极端贫乏，搜集极为困难。在此种条件下，作者殚精竭力，广搜旁求，历尽艰辛，从本书附录“参考征引书目”之详备，可以想见。这样才能达到目前论据充实、征引自如的境地。而丰足的资料，正是这本传论的物质基础、信用凭证。

作者治学态度极为严谨，一丝不苟。使用资料实事求是，不牵强附会，不生拉硬凑，但凭实际材料，作多层次多侧面的阐述，而不作主观臆测、鲁莽论断，通篇贯彻着唯物辩证精神。这里不妨就杨文驄毁誉焦点，引述一段文字，以见作者治

学态度。作者在以大量事实论证了杨文骢并未从清流中分化出去，倒向马、阮一边之后，又这样写道：

“平情而论，文骢是有缺点、错误的。他是诗人、画家，不失书生本色，对马、阮擅权乱政、结党营私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他好交游结纳，不拘小节，胸无城府，待人宽厚，在政治是非面前，原则性和斗争性不足；他具雄才壮志，谋匡时报国，可长期充任地方小吏，得不到施展机会，现在好不容易取得职位，就有所顾惜，不想和当权派决裂，而采取调和态度。但是，他对行私误国、罗织大狱、搜捕正人，是一直不满的，当善类遭遇危难时，或为之报警，或代谋缓解。从基本倾向看，他和马、阮之流是有显著区别的，他仍然站在清流一边，仍然不失为忧时爱国的有心人和有志者。唯其有上述的缺点、错误，他在这一时期的表现是缺乏光彩的。他的枝枝节节的补救，对于身受其惠的具体对象来说，他尽了友谊和道义，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并不能挽回局面，显得无足轻重。”

这种态度是科学的、公允的，因而是可信的，从而增强了正面的说服力。辩证的态度和方法，必然能得到辩证的效果。

除了政治生涯，作者还对杨文骢的文学、绘画成就以及美学思想，作了阐幽发微的探索和评析。指出他所抒之情主要有三：一为忧时爱国之情，二为师友骨肉之情，三为山水丘壑之情。而忧时爱国之情却是感情的主脉，贯串于一切，无往而不在，情溢乎词，充满积极奋发、乐观无畏精神。其力度、深度足以动人肺腑，催人奋发。其诗文中名篇警策，随处可见。例如：“一死能酬国，千呼不到家”，“书生亦有长缨在，虜血应教淬剑环”，“男儿矢报国。勿为安乐谋”，“幸昔挽强弓，今犹余健臂。走马若星飞，在手有六轡。岂无一腔血，愿言难真遂。……虽非终军年，颇饶贾生泪”等等，字里行间，一个忧时愤世、痛哭长歌的爱国诗人形象，呼之欲出。而他写山

水丘壑之情的诗篇，往往着墨不多，就能产生情景交融的意境，甚至驰骋想象，达到物我相得、心醉神移的情境，作者分析了文骢的爱国诗篇的四大特色，指出了文骢在山水诗发展史上的特殊贡献。

杨文骢的画传世极少，作者多年努力搜求，才汇集到书画照片三、四十幅，这是难能可贵的。篇中关于杨文骢美学思想的探讨，其最大成就，就是辨明了杨、董异趣。董其昌是晚明画坛的权威人物，松江派的领袖。当时画坛总倾向是临古摹古成风，创作衰微，董其昌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画风，更在山水画领域发生重大影响。他虽然也讲以造物为师，但他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旨在使“胸中脱去尘俗，自然丘壑内营”，不过为了促进画家的人品气质修养而已。而杨文骢则在继承五代、宋、元山水画写实传统基础上，提倡和坚持师法造化，模山貌水，“耻向他人逐脚跟”，师古不泥古，而是取法众长来描绘现实。因此可知两人的美学思想和艺术风格判然异趣，而杨文骢的主张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有人大约根据杨文骢常去拜望比他年长四十一岁的董其昌，以师礼相待，就论断为传艺受业的师承关系，把他列入松江派，这是误解，也是浅薄。

总之《杨文骢传论》在政治方面，深刻揭示了杨文骢从志士到烈士的发展过程；在文学艺术方面，揭示了作为一个爱国诗人、山水诗人，作为一个有强烈创作个性的画家的思想感情、美学观点的特色与成就，以坚实可信的论点和论据，作出了有力的论断，还杨文骢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此之前，我国还没有一本研究杨文骢的专著，没有一本公允翔实的杨文骢的传记和年谱。这部《杨文骢传论》，不但纠正了历史上的错误，填补了一项空白，它也“救活”了一位值得后人纪念和研究的历史人物，因此它的价值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我对国事凋敝、民族存亡绝续关头涌现的驰驱激越、慷慨

悲歌的爱国志士，向来倾心，这和我少年时“国破山河在”的生活环境有关。每读谭嗣同、秋瑾故事，辄感激神夺，大气厄塞于胸者累日。而杨文骢殆谭嗣同、秋瑾之流亚，虽属两个时代，而正气相贯，同声互应，读杨而不觉谭、秋闪烁其间，使我沉吟，使我愤激。从这个角度讲，白坚同志这本著作的终于问世，也是值得我们炎黄子孙感激不尽的，因为这正是我们民族的一份重要的精神财富。

不揣鄙陋，聊抒怀抱，谓之为序，未知有当否。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八日于南京苦丁斋。

目 录

序.....	丁 芒(1)
--------	--------

一、慷慨悲歌士 艰贞爱国人

(一) 家庭环境.....	(3)
(二) 青年时代.....	(14)
(三) 台荡之游.....	(22)
(四) 初充教谕.....	(32)
(五) 三任县令.....	(41)
(六) 历官兵部.....	(50)
(七) 苏州锄奸.....	(61)
(八) 浦城就义.....	(65)

二、丹青文字并珍奇

(九) 诗歌特色.....	(77)
(十) 杨董异趣.....	(91)
(十一) 画学师承	(100)
(十二) 绘画特色	(111)
(十三) 题画艺术	(124)

三、青史千年有是非

(十四) 生平剖视	(131)
(十五) 历史评价	(137)

后 记.....	(139)
----------	-------

附 录

一、杨文骢年谱 (简编).....	(143)
-------------------	-------

二、杨文驄题画论画诗辑录	(171)
三、杨文驄书画题记辑录	(208)
四、《杨文驄传论》参考征引书目	(218)

图版目录

- 一、赠玉吼兰竹图
- 二、台荡纪游图册之一：天台石梁（1629年）
- 三、台荡纪游图册之二：琼台双阙（1629年）
- 四、台荡纪游图册之三：灵岩寺（1629年）
- 五、台荡纪游图册之四：大龙湫（1629年）
- 六、秋林远岫图（1631年）
- 七、秋江渔隐图（1631年）
- 八、赠潭公山水卷之一（1635年）
- 九、赠潭公山水卷之二（1635年）
- 十、赠潭公山水卷之三（1635年）
- 十一、赠潭公山水卷之四（1635年）
- 十二、赠潭公山水卷之五（1635年）
- 十三、赠潭公山水卷之六（1635年）
- 十四、寿陈白庵山水卷之一（1636年）
- 十五、寿陈白庵山水卷之二（1636年）
- 十六、白日掩荆扉图
- 十七、赠晋昭山水扇面（1638年）
- 十八、林泉清集图册之一（1638年）
- 十九、林泉清集图册之二（1638年）
- 二十、林泉清集图册之三（1638年）
- 二十一、林泉清集图册之四（1638年）
- 二十二、林泉清集图册之五（1638年）
- 二十三、林泉清集图册之六（1638年）
- 二十四、枯木竹石图（1638年）

- 二十五、仙人村坞图（1642年）
- 二十六、江山孤亭图（1643年）
- 二十七、行书五言诗
- 二十八、草书与卓如同游金山诗扇面（1624年）
- 二十九、行书题马士英山水扇面（1645年）
- 三十、行书寿陈白庵诗（寿陈白庵山水卷后，1636年）
- 三十一、行书题董其昌苑西墨禅室画山水小卷（1645年）
- 三十二、手札
- 三十三、《山水移》集书影之一
- 三十四、《山水移》集书影之二
- 三十五、《洵美堂诗集》书影之一
- 三十六、《洵美堂诗集》书影之二

一、慷慨悲歌士 艰贞爱国人

(一) 家庭环境

后半生居住、活动于南京和江、浙一带的杨文驄，原先诞生、成长在西南高原的贵阳城。所以，史、志和有关记载多称他为贵阳人，他有时也自署夜郎。

他的祖籍，原是江西吉安。明初洪武年间，他的先世杨德，字克明，“以功授千户，征蜀著功，调守黔，黔之杨，自此始也”^①。为了表明祖籍，他在书画中多自署吉州^②。

文驄，字龙友，号山子，别署伯子^③。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八月，卒于隆武二年（1646）七月，年五十一^④。

①董其昌《明故亚中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参政鲁源杨公墓志铭》（以下简称“董志”），《黔诗纪略》卷十一《杨参政师孔》附；参道光《贵阳府志·余编·杂识上》。

②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作“山西吉州人”，误。隋于庐陵郡置吉州，寻废，唐复置。元升吉州路，改吉安路。明为吉安府，改吉安县，即今江西省吉安县。

③杨文驄所作《枯木竹石图》（今藏南京博物院），铃“杨伯子”白文方印。有谓文驄号“巽倩”者，乃据《二胥记》传奇所署“巽倩龙友氏评点”。然巽倩实此书序者马权奇之字，巽倩所评与马序所论若合符节，非关文驄也。

④陈子龙《安雅堂稿·杨龙友四十寿序》云：“去年秋。杨子既以试春官久不第，遂退而司教于吾邑。”“秋八月，为杨子悬弧之辰。”白坚按：文驄于崇祯七年（1634）任华亭教谕，志、传皆无异辞。以崇祯八年（1635）四十岁推之，生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文驄《丙子秋节后一日，有事青溪，戏作小景，偶闻虏信，恨不逃入此中，因赋赠徐惠朗》有“四十始服官”句，可资印证。文驄卒于隆武二年（即顺治三年，1646）七月，《史外》记述甚明，《思文大纪》、《明史》、《小腆纪传》、《贵阳府志》、《黔诗纪略》均无异辞。《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定其生卒为1597—1645，皆误。

他的祖父名云衢，“以子贵，屡封参议”^①。娶胡氏，继王氏。胡生师孔，即文驄之父。

师孔（1568—1629^②），字愿之，一字冷然，号鲁源，别号霞标、建霞。“生而英敏，幼年丧母，百罹备尝。性嗜书，闻有藏书，必假抄录，过目成诵。取材既博，藻思横生。食饩于庠，试冠曹偶。台使者郭公、杨公，有人伦鉴，奇公才，引重之，不以为诸生数。”^③

师孔初娶丁氏，早逝；眷念旧情，“义不再娶。郡守刘公曰：‘此奇节，非孝子所安也。’为缔姻于越公女”。越氏（名字无可考），即文驄之母。

师孔万历二十五年（1597）中举人，二十九年（1601）成进士。次年，任南直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县）令^④。“为政但以洁己爱民为要领”，“省防河之费，均践更之役”。时朝廷派驻淮地的矿税中使陈增、鲁保，怙宠擅权，结党扰害百姓。漕运总督兼凤阳巡抚李三才（字道甫），欲依法制裁，有司却有顾忌。师孔不动声色，作好调查准备。一日，出其不意，掩捕一批附阉的地方大猾，格杀百数十人。人心大快。识者认为：“公盖神勇不怒者，藉令公当日先见锋颖，渠魁能无伏罚乃尔！”以是，深为李三才所赏识，以公为能，上报山阳政绩，推为大江南北之首。而二阉则深以为恨，欲寻求瑕疵加以中伤。但师孔为官清廉，颂声载道，终无隙可乘。先后入京觐见，举“天下卓异第一”。未几，擢户部主事。离县之日，攀留者万余人，所乘车久久不得发。有位黄侍御，“有望

① “董志”。

② 据陈子龙《明故亚中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参政鲁源杨公墓碑》（《安雅堂稿》卷十二）。

③ “董志”，以下所述杨师孔事迹，除另行注明者外，均据此志。

④ 同治《山阳县志·职官一》。

于公，公不副，憾之，劾公”，外调顺天教官。万历三十八年（1610），加翰林院检讨，充福王讲官。因继母之丧而归，“而前劾公者，适拜京兆，修旧怨并下石”。因此，师孔服满也无意出山，侍奉云衢家居。及云衢病逝，抢地呼天，几次绝而复苏。

万历四十五年（1617）冬，补昌平学正。几年间，先后升国子监学正、工部都水司主事、屯田司郎中。“以裁损中涓帽价”触犯逆珰魏忠贤，遂有去志，因于天启四年（1624）调“云南按察使金事，兼提学”^①。次年，加参议衔。时贵州土官安邦彦叛军^②，进犯云南，巡抚闵洪学“檄公兼摄兵备事”。原来师孔虽是书生，自任昌平学正以来，“以课士余闲，从大将军较猎较射”，对战守韬略也有所探讨。天启元年（1621），安邦彦围贵阳，师孔时在省，曾与潘润民（字用霖，号朗陵，贵阳人）同任城守，终得解围^③。师孔有《解围志喜》一首云：

“朔风凛凛正重围，倏报王师指义旗。将略从天乘胜下，蛮云卷地望尘归。城头残垒闻嘶马，委巷尫羸笑启扉。自是天威雄绝傲，新标铜柱答垂衣。”^④

以学官而奉命兼摄兵事，是师孔的才能和业绩所决定的。于是他参与谋划，“使人间道邀曲靖之师夹攻安酋”，安邦彦遂夜

①③《黔诗纪略》卷十一《杨参政师孔》。

②天启元年（1621），永宁卫宣抚使奢崇明蓄异志，乘调兵援辽之机谋反，据重庆，“进围成都，伪号大梁”。水西土司安邦彦举兵应之，合兵攻掠，毒害近十年，为总督朱燮元所讨平。事见《明史》卷三一二。奢崇明、安邦彦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争权嗜利，为所欲为，其举兵属于分裂叛乱性质。

④《黔诗纪略》卷十一，道光《贵阳府志·余编·文征十四》。白坚按：“狂羸”两本均作“狂羸”，显系刊刻致误。